

BIOGRAPHIES OF THE 20TH CENTURY INTELLECTUAL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1896 ——— 1950

傅斯年传

焦润明 著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一生著述丰厚，对新文化建设、历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新教育思想的提倡等均有卓越的贡献……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傅斯年。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他是一个坚定反共的学者，他的许多错误且反动的言论也是在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因此，不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把应该属于傅斯年的还给傅斯年，客观、公正地评定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理应是治史者的原则和本分。

人民出版社

傅斯年传

焦润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刘大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斯年传/焦润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

(20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01-003742-6

I. 傅… II. 焦… III. 傅斯年-传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305 号

傅 斯 年 传

FU SINIAN ZHUAN

焦润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742-6 定价:24.00 元



作者简介

焦润明，1958年生，辽宁人。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发表《论历史学精神》、《梁启超的日本观》、《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三代伟人赶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符号的象征意义》等60余篇论文。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化史》（1999）、《清末维新潮》（1997）、《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001）等著作多部。

承担国家边疆史地工程项目《国际法与中朝边界争议问题》、省“十五”重点规划项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辽宁民俗变迁研究》、省教委课题《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社会观念的理解与接受过程研究》等。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钱 穆传

陈 勇著

梁漱溟传

郑大华著

傅斯年传

焦润明著

冯友兰传

田文军著

ISBN 7-01-003742-6



9 787010 037424 >

目 录

导 论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文化	(1)
第一章 家世与经历	(19)
一、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鲁西望族	(19)
二、破落的土族家庭与磨难的少年时代	(23)
三、人生阅历与个性品格	(30)
第二章 就读于北京大学	(34)
一、国学小专家	(34)
二、胡适的高足	(40)
三、创办《新潮》杂志	(44)
四、参加五四运动	(51)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57)
一、提倡文学革命	(57)
二、改良旧剧,创造新剧	(69)
三、倡导汉语拼音化	(77)
四、提倡科学批判传统学术	(84)
五、主张改造传统国民性	(93)
六、揭橥“新潮”自由主义	(104)
第四章 留学英德普被西方学术	(120)
一、学习西方:立志文化赶超	(120)
二、留学英德遍尝西学精蕴	(122)

三、西欧学术的影响	(131)
第五章 任教中山大学出任史语所所长	(139)
一、归国受聘中山大学	(139)
二、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	(146)
三、收集整理典籍,组织殷墟发掘	(158)
四、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	(162)
第六章 重构历史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	(166)
一、主张史学新思维	(166)
二、实证与比较的史学方法	(175)
三、人物评价标准的设定	(185)
四、编印历史教科书的原则	(193)
第七章 书生报国:拳拳的赤子之心	(199)
一、身处北平怀忧国	(200)
二、坚决抗日保中华	(211)
三、书生参战:思想力与舆论力的运用	(225)
四、对世界时局与中外关系的认识	(243)
第八章 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255)
一、办理北大迁校事宜	(256)
二、致力于恢复北大爱国传统	(263)
三、平息学潮营造平和的读书环境	(269)
第九章 书生参政:置身于政治漩涡之中	(281)
一、主张建立廉洁有力政府	(283)
二、力主建都北京开创全新国运	(300)
三、反共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正统”	(304)
第十章 建构新式教育理论	(317)
一、提出五大教育理想	(317)

二、改造传统教育模式	(330)
三、反对学校尊孔读经,主张设军训	(340)
四、聘任教师讲究资格与能力	(345)
五、“学术教育”与大学独立	(348)
第十一章 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357)
一、立志将台湾大学办成学术中心	(358)
二、用人唯才不讲关系	(369)
三、筹建大学生宿舍与改造附属医院	(374)
四、建立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校训	(380)
五、操劳校务身殉台湾大学	(385)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396)
后 记	(398)

导论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文化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一生著述丰厚,对新文化建设、历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新教育思想的提倡等均有卓越的贡献。正如胡适先生评价的那样,傅斯年的一生曾给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界撒下过无数有生命力的种子。其中有些种子已经发芽并成长,以至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傅斯年。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他是一个坚定反共的学者,他的许多错误且反动的言论也是在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因此,不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把应该属于傅斯年的还给傅斯年,客观、公正地评定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理应是治史者的原则和本分。

—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现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中的重要一员。

在中国,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尽管在清末即已出现,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但为数众多的大师级人物却涌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胡适、蔡元培、辜鸿铭、周树人、陈寅恪、傅斯年、丁文江、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梁思成、何思源等人。这些学者不仅精通中国国学,而且还广泛涉猎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其学术贡献都曾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界出现群星灿烂的繁荣景象,崛起一批真正具有学贯中西、精通文理各科的学者,可能要归因于这个时代所赋予的条件。其一,中国落后、西方先进所形成的中西文化巨大落差的刺激,使一代有志青年发愤图强,立志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报效祖国;其二,清末遍设新式学堂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大批青年走出国门,奔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直接吸收近代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三,传统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力的削弱,相对地造成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空间,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学人普遍形成了独立判断和个性自由的品格。总之,由于上述原因,不仅客观地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学术大师,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石,而且还塑造了一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被称为“士”的知识分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作为一个阶层出现了,不过它基本上是作为依附于贵族统治阶级的食客或谋士身份而存在的。自隋唐以后,随着大一统国家机器的逐渐完善,统治阶级通过科举制度广泛吸纳天下士子参与国家政权,从而使士与官结为一体,传统知识分子的主体即“士大夫”也就自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研读《四书》、《五经》,虽具有领会先贤微言大义的意义,但主要作用却是敲门砖,科举虽具有表现才华的功能,但主要却是作为进身官僚的阶梯。当学者把所学作为敲门砖,把所用作为改变自己身份的手段的时候,是不可能真正培养出这个阶层的独立意识的。在封建时代,体现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是他能不能金榜题名,能不能为官,这是仕途正业,除此之外,则一切都是俗流末业。这种价值观导致了“四书、五经”之外无学问,“科举为官”之外无坦途的社会现实趋向,并直接地影响着其他学问的研究和开发,妨碍着其他探讨自然与社会奥秘相关的事业的发展,这也自然成了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构成中,虽然忧君、忧国、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成为士人基本的精神品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士人忠诚的人格理想,但是对自然和社会奥秘探究的忘我态度,怀疑和求异精神,批判和创新意识,人格独立的自由主义精神等等

精神品质,在传统士大夫的价值构成中却并不完备。据此有理由说,以西方近代社会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的“知识分子”是在中国清末民初才出现的。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颇为复杂,概念繁多,但大都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2)受过教育并从事脑力工作的人;(3)受过教育并从事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的人;(4)受过教育后气质发生变化,从而在思想与行为上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人;(5)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以其为手段的人;(6)能够综合各种思想,以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并且以了解整个社会、解决社会上的问题为职责的人;(7)超越世俗的顾虑,在象征世界中为各种重大问题寻求解答的人;(8)以理念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人。^① 从上面归纳的一些特征出发还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一些本质的内容:其一,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他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其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存在社会的批评者,现有落后或非人道价值观念的反对者;其三,知识分子能够超越于个人利益得失,关怀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并且能用知识和理性,为人们指明迷途,开辟人类美好未来。总之,知识分子是以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方式去找寻、探究未来世界的美好,并成为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的行为主体。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那么只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最为符合。应该说,这代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追求知识、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和独立人格的一群——他们具有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其中,傅斯年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员。

傅斯年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具有如下一些经历和特质:

第一,学贯中西的经历。傅斯年从小就在祖父的指导下打下了良好

^① (美)水秉和:《知识分子的人文倾向》,《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 页。

的国学基础,其后又进入北京大学专攻国学。在西学方面,自1909年他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时就已开始学习,在北大期间更是耳濡目染。1919—1926年他又先后留学英、德,治数学、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逻辑学、地质学等学科,此外他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学科亦无所不学,无所不涉。这使他对西方科学有很深的理解,再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遂成为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学者。他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评价傅斯年“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①正由于这个原因,傅斯年提出的建立科学东方学的计划,他对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解,无一不与其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识相关。

第二,对世界的理性认识。由于他对中外社会的了解,承认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差距,主张实实在在的赶超。强调要吸取欧美社会发展曾出现的失误和教训,不学它失败的地方,只学它成功的地方。在国际上,他主张营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和平环境,行“万邦协和”外交,不树私敌,万不得已只树“公敌”。断言,中国只要有三五十年和平建设的环境,国力就可以大大培植起来。当然对于企图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变成奴隶的帝国主义则要坚决反抗,他的坚决抗日思想,即缘之于此。

第三,敢于批判现存社会制度,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愚民政策。傅斯年多次著文或在公开场合批判国民党政权只会“家争”,缺乏现代化的行政效率,甚至在思想观念上仍然是中世纪的,在政治上奉行的是人治,在体制上采用的是中世纪的分封制。他不仅反对在学校里尊孔读经,更反对在意识形态中卖弄“国粹”。他批判感情主义、官僚主义、面子主义和文牍主义,更批判一元主义和寺院主义。他告诫国民党当权者不能用宗法主义作为建设国家和组织国家的原则,认为这是愚民政策,而主张用法律陶冶民德,建设近代法制国家,敦促国民党进行政权的

^①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傅孟真传记资料》第1册第74页。

现代化建设。他还公开批判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阶级,公开向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行为挑战,素有“中国蟋蟀”和“傅大炮”之称。这种关心国事、敢于向现存政权和当政者挑战的勇敢精神,是一般文人特别是御用文人不可能具备的。

第四,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在傅斯年身上,思想自由具体地表现为一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个人独立的主体意识,去观察社会,评论社会,探讨学术。在学术上敢于突破传统成见,认为商纣王是“大英雄”,至于世传美谈的比干、微子不是“迂者”就是“鲜廉寡耻”者,这一观点是最能标志其一反常规的自由思考的。当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 1932 年在上海被租界工部局逮捕,移交国民党政府准备法办时,傅斯年挺身而出,一秉事实,不惜违背国民党上峰的政治意志,不以党派或团体的成见,给陈独秀以公正的评价。这是瞻前顾后考虑自己政治生命和前途命运的人所不敢为之事。追求人格独立,则表现在他专心向学,以学术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回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并以自由学者终其一生的品质。

第五,富有民族气节,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和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者。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精神特质,而这些在傅斯年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言论、著述和行为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因而被时人称为“狂热的爱国者”。他崇尚气节,推崇民族大义,视国家分裂为民族的耻辱,统一为民族大义,并把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作为“书生报国”的神圣职责。“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大造“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的谬论,以使其占领的地区合法化。为了驳斥侵略者的谬论,傅斯年联合几位学者,以书生报国的殷情,奋笔疾书,写成《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从民族学、语言学角度,用大量历史资料,证明东北原本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文化种族,与这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1932 年,傅斯年又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周刊,以其

作为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旗帜鲜明的文章,揭露、声讨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制造抗日的舆论。1935年,当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时候,在北平主政的萧振瀛召集教育界人士谈话,要求他们对日寇的入侵保持沉默,不要发表对日不利的言论,并以人身的安全为要挟。在座的傅斯年不顾个人安危,当即起立陈辞,痛斥萧振瀛,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抗日,使萧振瀛狼狈不堪。傅斯年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对日妥协投降的言行,遭到了日本人和亲日派分子的嫉恨,但他不畏强暴,依旧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怀。在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始终运用他的知名学者的思想力和影响力参与抗日的动员和士气的鼓动工作,以其特有的方式,去实践书生报国的志向。抗战胜利后,在接收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又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摒弃汉奸文人学者,不录用伪北大教职。他还反对美、英、苏等大国牺牲中国利益以换取他们之间利益的霸权行径。这些都体现了傅斯年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

从前述可以得出结论,傅斯年具备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基本品质,并以其独特鲜活的个性而成为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然,傅斯年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他坚定的反共思想,他的正统观念、忠君观念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依附人格,这使他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只要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傅斯年的人格构筑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二重价值观结构:一方面他非常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正统观的影响,又表现出异常突出的依附人格。在政治立场上,他虽然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但却始终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而加以拥护,把蒋介石这个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视为国家的代表。为此他坚定地反对共产党。他把共产党污蔑为“流寇”,基本上是这一反共思想的反映。在他看来,国民党政府虽有弊病,但它却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政权,因此任何无政府行为都是不

能允许的,“即使法国式的(内阁危机)也是要不得的”。^①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连篇声讨,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他站在正统观和反共立场上谩骂共产党更表明他反共价值观的明确性和指向性。他在1947年2月写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观念,无一同者……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②这一段文字最典型地暴露出他的反共本质。正是因为他始终把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所以现实生活中他只有反对贪官污吏的勇气,而绝无“犯上作乱”的决心。这就决定了他一生难以割舍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而甘愿为之殉节。当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因对国民党的不可救药而悲观失望自杀时,傅斯年精神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遂产生自杀之念。由于其反共立场,傅斯年最终只能随他目为合法政权的国民党一起迁往了台湾。这自然也是他的价值观使然,更是其悲剧所在。

毫无疑问,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经历奇特、复杂的历史人物。因而对他的评价也自然会众说纷纭。

二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较大,如果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史学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若不谈到傅斯年的相关思想,则是不完整的。

傅斯年对以民主和科学为基石的五四新文化曾做出过重要贡献。遗憾的是,现在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述,在行文中提到傅斯年的地方很

^① 罗大文:《论古典爱国主义思想》,《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

^② 《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0页。

少,大都一带而过。其实,傅斯年作为“五四新文化派”中的重要成员,在传播民主和科学思想、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运动中,其贡献和影响仅次于陈独秀和胡适。这可以他当时在《新青年》和《新潮》杂志发表的大量论著为证。因此,研究傅斯年的相关思想对于丰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因他曾参与创办影响仅次于《新青年》的《新潮》杂志,姑且把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称之为“新潮自由主义文化思想”。

1917年前后,由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开明治校,使大批新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陆续聚集北大,遂使北大渐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傅斯年因受新文化浪潮的激荡而加盟新文化派,随即成为该派中的一员主将。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等文。1918年11月,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创办《新潮》杂志,傅斯年作为主编,使《新潮》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另一个传播新文化的阵地,他还在该刊相继发表了《怎样做白话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随感录》、《人生问题发端》、《对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等文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新潮”自由主义文化思想。

第一,追随陈独秀、胡适,揭橥文学革命的大旗。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傅斯年以学生身份加盟,成为文学革命运动的追随者和参与者。继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傅斯年发表了《文学革新申义》,系统地深化了胡、陈首倡的文学革命思想。他认为文学本是真正自然地表达人类感情的工具,真正本于人性自然、毫不掩饰、感情自然流露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但是,自汉代以后,中国文学都逐渐偏离了文学自然抒发的特性,沦落于为专制制度歌功颂德的工具。文学失去了思想性。文学的表达手段大都为贵族专用之文言,而与民间白话俗语相分离,于是文学也逐渐脱离了民众的现

实生活,变成了死的文学。因此,解决言文分离的问题,把民间鲜活的白话口语引入文学,来表达文学,这是傅斯年主张文学革命的核心问题。此外,他还主张破坏旧文学的信仰,建设新文学的灵魂。

文学既然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文学的变迁就必然与时代同步。反映共和时代的文学,开放的文学,崇尚思想和个性的文学,理应成为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学内容,其中“不居的而非常住的,无尽的而非有止的,创造的而非继续的”,就是傅斯年所要倡导的新文学精神。关于新文学建设的具体问题,傅斯年也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如吸收民间俗语中的景物、动作的描述词语,吸收文言文中的名词,采用西方语言的语法逻辑和构词方法等等。此外,在戏剧方面也必须改良,用以作为传播新文学的手段。

他还强调新文学必须赋予新的精神,否则虽然用了白话,但如果在心理上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忠孝节义、鬼狐神怪的观念,那么仍达不到以人本主义为核心来建筑新文学的目的。总之,傅斯年的文学革命思想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实现手段方面都大大深化了胡适、陈独秀的主张,从而使他成为与胡、陈齐名的思想家。

第二,提倡民主、科学,批判传统国民的依附、迷信的劣根性。对于民主,在傅斯年那里更多地被理解为自由、平等和独立,从他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言论中,可以更多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也与其他先辈一样,把去除奴隶根性、成就独立自主的国民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国民的劣根性主要表现在缺乏个性,没有责任感;多投机主义,缺乏远大理想;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只知盲从,不知创新等四大方面。造成这些劣根性的原因就是专制制度的摧残,人民缺乏最基本的权利,社会缺乏严密的组织,缺乏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的机制和环境。

为了建设近代新国民国家,傅斯年建议发动一场改造国民性运动,借以唤起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他强调青年应当超凡脱俗,保持自己的身心独立,主张改造封建家庭制度及其伦理道德观念,树立“公正福祉”的人